

“隔绝羌胡”与“通货羌胡”：丝绸之路河西段的民族关系^①

王子今

内容提要：对于西北方向复杂的民族关系，贾谊曾经提出予以分化的战略构想。张骞“凿空”的最初动机，是与大月氏建立联合对抗匈奴的同盟。河西边防建设有明确的在保障东西交通的同时“隔绝羌胡”的军事目的。河西丝路于是具备交通东西而隔绝南北的特殊功能。从军事史、民族史、交通史的视角考察河西丝绸之路史，应当注意这一形势。随着贸易的繁荣与文化的融合，汉与胡、羌在河西地方实现了密切的交往，民族关系的新形势得以出现。考察从“隔绝羌胡”到“通货羌胡”的历史变化，经济生活中商业贸易的活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丝绸之路 河西四郡 羌胡 羌虏 隔绝羌胡 通货羌胡 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 (2019) 01—0001—10

DOI: 10.16363/j.cnki.xyyj.2019.01.001

早在汉文帝时代，贾谊对于西北方向复杂的民族关系即曾经提出予以分化的战略构想。按照汉武帝指令，张骞“凿空”的最初动机，是与大月氏建立联合对抗匈奴的同盟。霍去病对河西地方的军事控制改变了西北民族分布的格局。河西军事部署与边防建设有明确的在保障东西交通的同时“隔绝羌胡”的目的。河西丝路于是具备沟通东西而隔绝南北的特殊功能。从军事史、民族史、交通史研究的视角考察河西丝绸之路史，应当注意这一特殊的交通格局。随着丝路贸易的繁荣与文化的融合以及西域民族关系的变化，汉与胡、羌在河西地方实现了密切的交往，民族关系的新形势得以出现。在从“隔绝羌胡”到“通货羌胡”这一推促民族文化向和平交往趋向演化的历史进程中，商业经营的繁荣以及“胡商”的活跃，发挥了显著的积极的作用。

一、《新书·匈奴》“备月氏、灌颯之变”设想

贾谊少年时即以博士身份参与长安最高政治决策，却眼光新锐，见识深远，视野宏大。^② 刘

①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项目编号：10XNL001）阶段性成果。

② 《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所说，贾谊任博士时“年二十余，最为少”，行政咨询时，“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以致“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而“孝文帝说之”。中华书局，1959年，第2492页。

向曾经称赞贾谊“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① 后人所谓“宏识巨议”^②，所谓“卓卓乎其奇伟，悠悠乎其深长”^③等，都注意到贾谊思想的这一特点。或说其论“以取验于身后”^④，或说“后皆遵之有效，一一如谊所言”^⑤，或说“生之言，后多见之施行”^⑥，后人肯定贾谊的战略眼光，称《新书·匈奴》中提出的“备月氏、灌颯之变”的主张，就是对于汉帝国的边疆与民族问题、军事与外交问题的重要的建议，形成了西北战略的新思路。

《新书·匈奴》写道“将必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制之令千家而为一国，列处之塞外，自陇西延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颯之变，皆属之直郡，然后罢戎休边，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内行外信，四方悦服，则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与嘿嘿。”^⑦ 贾谊最早关注到较匈奴距离汉地更为遥远的草原政治实体的存在，最早明确提醒执政集团应当重视这些政治实体在草原民族关系、军事格局和文化竞争中的作用。这些见解的提出，自然有身为博士，能够利用皇家核心档案及时了解相关信息的优越的客观条件。而利用草原民族相互矛盾的思维方式，体现出特殊的智慧。

贾谊吸引匈奴内附，参与边地防卫，“使备月氏、灌颯之变”设想的提出，注意到匈奴以外暂时尚未对中原造成威胁的草原民族的实力，预料到草原民族关系可能发生的分化。“月氏、灌颯”由于与匈奴积累的长期仇怨，在匈奴内附，“为汉臣民”，愿意为汉王朝“卫边”的情势下，也会成为汉的敌对方。然而在汉王朝与匈奴处于战争状态的背景下，则很可能有靠近汉王朝、接近汉王朝、亲近汉王朝的倾向。对于“月氏、灌颯之变”的考虑，是贾谊追求“内行外信，四方悦服”理想政治目标之战略设计的重要内容。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写道，冒顿时代，“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张守节《正义》：“已上五国在匈奴北。”^⑧《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北服浑庾”作“北服浑颯”。^⑨“灌颯”、“浑颯”、“颯浑”相互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还需要认真的辨析。我们以为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新书》所谓“灌颯”作为与匈奴曾经发生战争关系的遥远的北族，受到了汉初政论家贾谊的关注。而相应的建议，对于汉王朝军事外交决策以及西北局势变化的走向，后来也发生了明显的影响。

二、张骞“凿空”功业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试图联络匈奴宿敌月氏，谋求“共击”匈奴：“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

① 《汉书》卷四八《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265页。

② （明）李梦阳《贾子序》，〔汉〕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附录四，中华书局，2000年，第519页。

③ （明）黄宝《贾太傅新书序》，〔汉〕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附录四，第520页。

④ （明）张志淳《订注贾太傅新书序》，〔汉〕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附录四，第528页。

⑤ （明）胡价《贾子跋》，〔汉〕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附录四，第516页。

⑥ （清）卢文弨《重刻贾谊新书序》，〔汉〕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附录四，第531页。

⑦ （汉）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134页。

⑧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893页。

⑨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53页。

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汉武帝“通使”月氏的意图，或许与贾谊有关“月氏、灌颯”的军事外交建议有内在的关系。往月氏，“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① 汉武帝时代联络月氏、大夏、乌孙“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的意图，以及利用匈奴仇国“报胡之心”，寻求“灭胡”盟国的努力，虽然没有获得直接的成效，然而张骞通过艰辛的交通实践，实现了与草原远国的直接交通。

“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② 张骞通过艰苦的西域探险，掌握了有关“西极”之地的新鲜知识，充实了西汉人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中原文化向西传布，也进入了新的境界。这一历史成就对于“丝绸之路”开通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汉军击破匈奴，打通河西通道之后，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次奉使西行，试图招引乌孙东归。这一目的虽然没有实现，但是通过此行，汉王朝和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得以加强。

西域本与匈奴有更密切的关系。汉武帝时代，汉王朝在较为后进、较为被动的情势下与匈奴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通过军事和外交的努力，终于扭转了局面。后来几经反复，汉文化实现了在西域地方的有效扩张，西域诸国“修奉朝贡，各以其职”^③，终于成为历史定局。

三、河西四郡设置：“隔绝胡与羌通之路”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汉军远征。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西北行千余里，数战数捷，缴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季，又从北地（郡治在今甘肃庆阳西北）出击，逾居延海，南下祁连山，孤军辗转二千余里，在麟得（今甘肃张掖西北）一带大败匈奴军，斩杀三万二千余人，俘虏匈奴贵族五十九人，官吏六十三人。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同年秋，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四万余众降汉。霍去病奉命受降，又在极复杂的情况下，坚定果敢地平定了匈奴部众的内部叛乱，使安置匈奴内附的计划得以成功。

汉武帝在河西休屠王、浑邪王故地设置酒泉（郡治在今甘肃酒泉）、武威（郡治在今甘肃武威）、张掖（郡治在今甘肃张掖西北）、敦煌（郡治在今甘肃敦煌西）四郡，从关东地区徙置数

①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57～3158页。

②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60页。

③ 《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下》，第4268页。

十万移民充实这一地区。河西地区的安定,使西北方向的开发进入了新的纪元,打通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往的通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一举措,“不仅对于中国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即对于整个东方的历史,亦具有重大意义。”^①

河西置郡的重要目的,是开通往西域通道,同时断绝匈奴人与羌人的联系。这后一主题,当时称作“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有这样的记载:

汉使杨信于匈奴。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②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写作:

汉使杨信使于匈奴。是时汉东拔岁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③

所谓“隔绝胡与羌通之路”、“隔绝胡与羌通之路”,是河西经营的重要目的。《盐铁论·西域》:

大夫曰“往者,匈奴据河、山之险,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强,行入为寇,则句注之内惊动,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时,虏入萧关,烽火通甘泉,群臣惧不知所出,乃请屯京师以备胡。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先帝推让斥夺广饶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拒匈奴,断其右臂,曳剑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广用,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未睹其计之所过。”^④

所谓“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指出匈奴曾经占有的战略优势。而汉武帝“隔绝羌、胡”,是实现形势转化的重要步骤。所谓“瓜分其援”,即《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的表述也与《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及《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有异,可能由于突出“羌”的历史记述,“胡与羌”的语序颠倒,也称为“羌胡”:

……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

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⑤

汉武帝时代的军事远征,西北方向称“北却匈奴,西逐诸羌”,则“匈奴”在“北”,“诸羌”在“西”。而所谓“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称“南北不得交关”,则“羌”在“南”,“胡”在“北”。《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羌。”司马贞《索隐》:“《说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续汉书》云‘羌,三苗姜姓之别,舜徙于三危,今河关之西南羌是也’。”^⑥“羌”“胡”是汉王朝在西北方向主要敌手。《盐铁论·未通》:“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囿圃,却羌、胡以为苑囿。”^⑦所谓“却羌、胡”,总结了西北战略的成功。

① 张维华《论汉武帝》,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52页。

②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913页。

③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73页。

④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中华书局,1992年,第499页。

⑤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6页。

⑥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891页。

⑦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第190页。

言“羌”的活动地域，称“西方”者，是以中原或以长安地方为方位判定的认识基点。“南羌”之说，则应当出自以河西地方为本位的判断，或说“河关之西南羌”。其对应的“北”方，是“胡”即“匈奴”的力量所在。

河西汉简频繁出现“虏”的名号，或可与“胡”互称，亦可见“胡虏”。河西出土汉简可见如下简文“□□二年十月壬午朔庚寅□□尉史世使移郡大守属国都尉农□□□□□□□□□□党及胡虏第□□□□出惊□昭武备迹候望□守摸□□集所主羌胡为务”(73EJT6: 74)，一条简文同时出现“胡虏”与“羌胡”，也值得我们注意。简文内容有时又体现出相当复杂的民族关系。如“捕斩匈奴羌虏赏科别”(F22: 221-235, 691, 692, 825)。或可读作“匈奴”与“羌虏”并列，也许是“匈奴虏”与“羌虏”并列。

四、河西交通格局：东西“通西域”，南北“隔绝南羌、匈奴”

西汉王朝河西经营所谓“隔绝胡与羌通之路”的战略目标，值得我们在考察当时民族关系与战争局势的基础上认真理解。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在陈说军事地理、交通地理形势时，明确说到汉武帝时代对河西地方的争夺、控制与经营：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①

又《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以“赞曰”形式表述的内容，有如下文字：

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②

此虽说“隔绝南羌、月氏”，似与《地理志》“隔绝南羌、匈奴”不同，但是上文说“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也强调了对匈奴“结党南羌”的警觉。而“兼从西国”者，是指控制胁迫西域诸国与汉王朝对抗。“西国”就是“西域”。^③又《汉书》卷七三《韦贤传》载刘歆议，则说：

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肩。^④

出现另一说法。言“婼羌”者，似乎体现以“隔”的方式，对匈奴“兼从西国”的防备。然而《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陈忠上疏：

① 颜师古注“隔与隔同”《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44~1645页。

②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28页。

③ 陈桥驿曾经写道“西域之名由来已久，《史记·大宛列传》：‘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清徐松认为‘古音国读如域’（《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因此，《史记》‘西国’即是‘西域’。”陈桥驿《〈西域历史地理〉序》，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页。徐松“国读如域”说，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徐松曰“《史记·大宛传》：‘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古音‘国’读如‘域’。《广雅·释詁》：‘域，国也。’”中华书局，1983年，下册第1604页。有的历史地理学论著支持这样的认识。侯丕勋，刘再聪主编《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第11页。参看王子今《“西域”名义考》，《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100~105页；拙著《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7~10页。

④ 《汉书》卷七三《韦贤传》，第3126页。

遂开河西四郡，以隔绝南羌。

李贤注 “《前书》云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臂也。”^① 曹金华《后汉书稽疑》认为，“‘婼羌’当作‘南羌’。”^②

所谓“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以及“通西域……隔绝南羌、月氏”，一言“通”，一言“隔绝”，前者“以通西域”，是我们总结丝绸之路史的共识，后者“隔绝南羌、匈奴”，以及“隔绝南羌、月氏”，则似与交通开发的历史主题相悖。也就是说，对于东西方向“通西域”的交通作用予以维护，对于南北方向“南羌、匈奴”间，以及西北、东南方向“南羌、月氏”间的交通条件则予以“隔绝”。河西交通格局这一特殊情形，与“南羌、匈奴”活动导致的民族关系之错综复杂、军事形势之变幻无定的条件有关。

无论是“隔绝南羌、匈奴”还是“隔绝南羌、月氏”，“南羌”都是战略防备的重心。“南羌”作为民族称谓，在《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中出现多例。^③ 可知当时是确定的民族地理概念。新疆汉代遗存所见有“讨南羌”字样的织锦，告知我们“南羌”曾经是丝绸之路交通长期提防与警备的民族力量。^④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记载，羌确实曾经“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遂“共攻”汉地，导致严重的军事危机：

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⑤

可知“隔绝羌胡”的战略设计，是有敌情依据的。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保边塞”是河西军民共同的责任。河西四郡地方行政也“咸以兵马为务”。^⑥

考察丝绸之路史，不能忽视河西路段一则“通”，一则“绝”的交通战略。这是交通史上的

①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12~2913页。

② 曹金华指出“章怀注‘《前书》云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臂也。’余按：此谓‘河西四郡’，注及三郡，疑有脱误，又‘婼羌’当作‘南羌’。《汉书·地理志》：‘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西域传》赞‘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后汉书稽疑》，中华书局，2014年，第1234页。

③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金城郡”条“河关，积石山在西南羌中。”第1611页。“酒泉郡”条：“禄福，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敦煌郡”条“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龙勒，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第1614页。今按：“积石山在西南羌中”，中华书局标点本对“西南羌中”四字仅“羌”字使用下划线，似不以为其中有可以理解为地名者，即读作“西南”方向“羌中”。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西”方之“南羌中”。《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李贤注“河关，县，属金城郡。以上并《续汉书》文。”“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可以与《地理志》“河关，积石山在西南羌中”对照读。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河关之西南羌地”，“羌”字标下划线以指示族名。第2869~2870页。也不理解为“河关之西”的“南羌地”。

④ “南羌”作为民族称谓在汉末依然使用。《三国志》卷一八《魏书·张就传》裴松之注，第552~553页。

⑤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76~2877页。

⑥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45页。

一个特殊现象，也体现了丝绸之路河西路段特殊的交通文化个性。

还应当看到，与汉王朝长期进行军事竞争的匈奴，也采取“隔绝”汉与西域交往的策略，即所谓“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

五、多民族开辟丝路的贡献与河西民族关系的新局

丝绸之路的开通，是多民族共同努力创造的历史文化成就。我们可以通过张骞“凿空”的合作者的族属，以及各民族参与丝绸之路贸易活动的实践，认识这一历史事实。^①

前引《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似乎“羌”“胡”“合兵”“共攻”的危机已经解除，“南羌”已经退却，然而《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陈忠上疏仍然有对于“北虏”可能“威临南羌，与之交连”的忧虑，以为“如此，河西四郡危矣”，而“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②。

我们还看到汉末“南羌”军事力量介入河西政治纷争的情形。《三国志》卷一八《魏书·张就传》裴松之注“杨阿若后名丰，字伯阳，酒泉人。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故时人为之号曰‘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诛郡中强族黄氏。时黄昂得脱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数斛，募众得千余人以攻揖。揖城守。丰时在外，以昂为不义，乃告揖，揖妻子走诣张掖求救。会张掖又反，杀太守，而昂亦陷城杀揖，二郡合势。昂患丰不与己同，乃重募取丰，欲令张掖以麻系其头，生致之。丰遂逃走。武威太守张猛假丰为都尉，使赍檄告酒泉，听丰为揖报仇。丰遂单骑入南羌中，合众得千余骑，从乐涇南山中出，指趋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骑下马，曳柴扬尘。酒泉郡人望见尘起，以为东大兵到，遂破散。昂独走出，羌捕得昂，丰谓昂曰‘卿前欲生系我颈，今反为我所系，云何？’昂惭谢，丰遂杀之。时黄华在东，又还领郡。丰畏华，复走依燉煌。至黄初中，河西兴复，黄华降，丰乃还郡。”^③所谓“丰遂单骑入南羌中，合众得千余骑，从乐涇南山中出，指趋郡城”的记载以及“羌捕得昂”的情节，都明确记录了“南羌”武装“指趋郡城”，甚至控制当地局势的情形。不过，河西地方汉人实力集团武装争斗的激烈似乎超越了民族矛盾。“南羌”骑兵并非立足“南羌”民族立场发起军事行动，而是作为借力参与了汉民族不同集团之间的争夺。

“羌胡”参与汉地武装争斗史事，又有两汉之际卢芳“王莽末，乃与三水属国羌胡起兵”。^④

① 参看王子今《草原民族对丝绸之路交通的贡献》，《山西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52~63页；《早期丝绸之路跨民族情爱与婚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25~35页；《丝绸之路贸易史上的汉匈关系》，《文史知识》2017年第12期，第3~9页；《多民族共构丝绸之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120~126页。

②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12页。“羌胡”“合兵”史例，有《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句龙吾斯等东引乌桓，西收羌胡，寇上郡，立车纽为单于。”“使匈奴中郎将张耽大破乌桓、羌胡于天山。”第270~271页。

③ 《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552~553页。

④ 《后汉书》卷一二《卢芳传》，第506页。

六、“保塞羌胡”历史角色与河西民族交往走廊的形成

汉代西北方向的民族构成,往往有以“羌胡”总称带有敌意的少数民族的情形。《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赞曰“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列举白起、王翦、王围、甘延寿、公孙贺、傅介子、李广、李蔡、苏建、苏武、上官桀、赵充国、廉褒、辛武贤、辛庆忌等,“皆以勇武显闻”。又分析了这一人才地理现象的原因“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①所谓“羌胡”,是构成民族地理形势的重要因素。赵充国上状报告平定羌人暴动的战况“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颜师古注“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师古曰‘如说非也。谓羌受充国之言,归相告喻者也。羌虏即羌贼耳,无豫于胡也。’”^②如淳之所以以“羌胡”解释“羌虏”,可能是基于人们叙说西北民族关系时的语言习惯。《汉书》卷七九《冯奉世传》:“元帝即位,为执金吾。上郡属国归义降胡万余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属国胡伊鲁若王亦将众数千人畔,奉世辄持节将兵追击。”颜师古注“言西河、上郡羌胡反畔,子明再追撃之。”^③此说“降胡”反叛,其实亦无豫于羌,而颜师古以“羌胡”解说,犯了与他所驳议的如淳同样的错误。《汉书》卷七五《翼奉传》所见“西远羌胡之难”^④,也反映“羌”与“胡”共同构成西北边疆民族问题的情形。

然而民族关系史的演进,又出现了新的形势。卢芳“使使与西羌、匈奴结和亲”^⑤,体现出边地民族关系的新局面。郑兴语隗嚣,曾言“将军据七郡之地,拥羌胡之众,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李贤注“七郡,天水、陇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城也。”又说:“兴尝为凉州刺史,嚣为西州将军。”^⑥所谓“拥羌胡之众”实力的形成,或有来自河西的军众集结。邓训事迹可见这样的情节“议者咸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护。”邓训否定这样的意见,主张“以德怀之”,“由是湟中诸胡皆言‘汉家常欲斗我曹,今邓使君待我以恩信,开门内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欢喜叩头曰‘唯使君所命。’训遂抚养其中少年勇者数百人,以为义从。”在对叛羌作战时,邓训曾“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长史任尚为叛羌所攻,“于是义从羌胡并力破之,斩首前后一千八百余级,获生口二千人,马牛羊三万余头,一种殆尽。”邓训去世,“吏人羌胡爱惜,旦夕临者日数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骑马歌呼。至闻训卒,莫不吼号,或以刀自割,又刺杀其犬马牛羊,曰‘邓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⑦邓训作为实现民族亲和新境界的典范,曾经在河西任职,“拜张掖太守”。自元和三年(86)至章和二年(88)任职张掖期间,邓训处理民族关系“以德怀之”的风格一定曾经对张掖地方有积极的影响。重视民族团结的风格绝不只是表现于个人行政实践。凉州“戎夷”

①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第2998~2999页。

②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第2987页。

③ 《汉书》卷七九《冯奉世传》,第3295~3296页。

④ 《汉书》卷七五《翼奉传》,第3176页。

⑤ 《后汉书》卷一二《卢芳传》,第506页。

⑥ 《后汉书》卷三六《郑兴传》,第1220页。

⑦ 《后汉书》卷一六《邓训传》,第609~612页。

与“凉州刺史”有良好的关系，见于《后汉书》卷五六《种暠传》：“后凉州羌动，以暠为凉州刺史，甚得百姓欢心。被征当迁，吏人诣阙请留之，太后叹曰‘未闻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许之。暠复留一年，迁汉阳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汉阳界，暠与相揖谢，千里不得乘车。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①他在汉阳“化行羌胡”的做法，应当是“为凉州刺史”时成功政策的延续。我们看到“窦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受到帝王嘉奖的情形。^②于是有官员“案行凉州边境，劳赐保塞羌胡，进屯酒泉”事迹。^③马武在面对“西羌寇陇右”的情势下，“将乌桓、黎阳营、三辅募士、凉州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万人击之。”^④所谓“凉州诸郡羌胡兵”很可能有相当部分来自河西四郡。《后汉书》卷二三《窦固传》：“固与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⑤则是明确的河西“羌胡”军人在汉王朝军官指挥下参战的实例。另一确切的有关“河西四郡羌胡”的史料，即《后汉书》卷四七《梁懂传》：“诏懂将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骑驰赴之。”^⑥

前引《后汉书》卷一九《耿秉传》所见“保塞羌胡”民族称谓，又见于《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河西民俗质朴，而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其后匈奴惩义，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⑦既有“羌胡犯塞”事，又有所谓“保塞羌胡”，说明“羌胡”民族表现的复杂。

从“隔绝胡与羌通之路”，“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到“羌胡”以“保塞”为职任，河西地方民族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河西地方从多民族战争争夺的热点，演变为民族交往的走廊。

这一变化的发生，有丝绸之路经济作用的因素。《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记载“遭王莽乱，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请奋署议曹掾，守姑臧长。八年，赐爵关内侯。”而“姑臧”地方的经济形势，通过孔奋事迹得到反映：

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奋在职四年，财产无所增。

所谓“市日四合”，李贤注：

古者为市，一日三合。《周礼》曰“大市日侧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今既人货殷繁，故一日四合也。

在“奋在职四年，财产无所增”句后，《孔奋传》还写道“事母孝谨，虽为俭约，奉养极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时天下未定，士多不修节操，而奋力行清絜，为众人所笑，或以为身处脂膏，不能以自润，徒益苦辛耳。”“陇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征召，财货连轂，弥竟川泽。唯奋无资，单车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谓曰‘孔君清廉仁贤，举县蒙恩，如何今去，不共

① 《后汉书》卷五六《种暠传》，第1828页。

② 《后汉书》卷一九《耿恭传》，第723页。

③ 《后汉书》卷一九《耿秉传》，第717页。

④ 《后汉书》卷二二《马武传》，第786页。

⑤ 《后汉书》卷二三《窦固传》，第810页。

⑥ 《后汉书》卷四七《梁懂传》，第1591页。

⑦ 《后汉书》卷一九《耿秉传》，第797页。

报德!’遂相赋敛牛马器物千万以上,追送数百里。奋谢之而已,一无所受。”^①孔奋的“清絜”“清廉”堪称“士”的典范。我们以为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姑臧称为富邑”,喻为“脂膏”的繁荣。“市日四合”的经济形势的形成,当然与丝绸之路贸易有关。而“羌胡”的积极参与,意义尤为重要。所谓“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所谓“姑臧吏民及羌胡”“遂相赋敛牛马器物千万以上,追送数百里”,都可以说明“羌胡”受益于姑臧市场的情形。

考察相关历史文化现象,也应当关注来自西域,曾经与汉人以及“胡羌”“羌胡”均有过交往的“商胡”“贾胡”在河西地方的活跃表现。^②

我们认识和理解丝绸之路河西路段的军事史、民族史和交通史,都应当注意河西“羌胡”之地位、表现及其历史文化作用的变化。从“隔绝羌胡”到“通货羌胡”,是丝绸之路史涉及民族关系史与经济生活史的重要演变,应当引起研究者的特别关注。而结合考古文物资料进行更深层次的考论与说明,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责任编辑:陈霞

责任校对:王文洲

^① 《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第1098~1099页。

^② 王子今《汉代的“商胡”“贾胡”“酒家胡”》,《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第110~114、128页。

**“Isolating the Qiang-Hu” and “Trading through Qiang-Hu”: Ethnic relations
of the Silk Road at Hexi section**

Wang Zijin (1)

Abstract: For the complex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northwest, Jia Yi once proposed a strategic policy of differentiation to the local ethics. While the initial purpose of Zhang Jian’s “Chiseling the Empty Space” at Hexi area was to establish a coalition with Da-Yue-Shi to fight against the assemblage of Hung. The defensive constructions on the frontier in Hexi has a clear military purpose of “separating the Qiang and Hu”, safeguarding the east-west trading route. Hexi Silk Road has its special functions of keeping through east-west trading route but isolating the north from sou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litary, transport and ethnic history, we should take special notice on this dynamic situation when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y of the Hexi Silk Road. Along with the prosperity of trade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Han and Hu-Qiang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 in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in the Hexi area, and a new situation of ethnic relations has emerged.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ical changes from “isolation of Qiang-Hu” to “Trading through Qiang-Hu”, this changing policy once had played an active role among the commercial trade for the economy of the time.

Keywords: Silk Road; Four Counties of Hexi; Qiang-Hu; Qiang Captures; Isolating the Qiang-Hu; Trading through Qiang-Hu; Ethnic Relation

A new research of the life of Sūghūnjāq Āqā based on the Persian and other texts:

also on the Uyghurs in Ily Khanate

Chen Xinyuan (11)

Abstract: Sūghūnjāq Āqā, wh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Ily Khanate, served three Khans in Hūlāgū Abāqā and Ahmad, once acted as a regent with an eminent status. While many western scholars have mixed him with another Mongolian dignitary from the Suldus tribe with the same name of Sūghūnjāq Āqā. Based on carefully comparative studies from the Chinese and Persian literatures, this article has confirmed his Uyghur identity, and then investigates his life. It also discusses the role of Uyghur groups had played in the history of Ily Khanate and points out they were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ruling group of Ily Khanate.

Keywords: Uyghur; Ily Khanate; Sūghūnjāq; Hulagu; Albaha; Aqam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on the Xinjiang education
during the ending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a Xiuhui (26)

**Currency, Politics and Sovereignt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Monetary Reform
in Sinkiang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Yu Ning (35)

Abstract: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monetary system of Sinkiang had long been independent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full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o some extent, made Sinkiang monetary system have more intersections wit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fter Sheng Shih-ts'ai's claiming loyal to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1942,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sisted on adopting a flexible governance policy towards Sinkiang. Under the premise of maintaining the credit of new currenc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put the legal tender in Sinkiang into use step by step, which symbolized national sovereign currency and the stability of Sinkiang's social economy was secured in this way. After Sinkiang was included under the direct governanc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lthoug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Sinkiang local government exerted every effort to reduce issuing new currency and suppressing inflation, but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continuous military defeat, the effect of which was of little success. During